蘇軾易學研究

邢春华◎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邢春华，女，汉族，20世纪70年代生人，陕西华县人，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1997年7月至2005年9月，在陕西渭南电视台工作；2005年9月至2008年7月，2008年9月至2011年7月，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张善文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8年7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11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2011年12月进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易学研究 / 邢春华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518-0282-6

Ⅰ. ①苏… Ⅱ. ①邢… Ⅲ. ①《周易》-研究②苏轼(1036~1101)-文学研究 Ⅳ. ①B221.5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4674 号

苏轼易学研究

邢春华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079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渭南市瑞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9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282-6
定　　价	40.00 元
网　　址	www. http://www. sqcbs. com

前言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书法被称为宋代三大家之一。然而作为一名经学家，尤其是作为一名易学家却鲜为人知晓。他治《易》研《易》家学渊源深厚，学《易》之路漫长而艰辛，用《易》于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精到而独特。《东坡易传》是苏轼研《易》之后在哲学领域积极探索和思想沉淀的智慧结晶，是他建构其哲学体系所作努力的丰硕成果，他的思想融合了儒、佛、道三家的睿智，《东坡易传》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儒、佛、道三家文化交相融合的产物，更是苏轼哲学思想的璀璨光芒。苏轼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家庭伦理思想在《东坡易传》中得到了精到阐发并进一步完善了苏轼的学说体系，哲理中蕴含着苏轼个人坎坷经历和他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索，厚重的人生阅历和高超的文学素养使他对《易》理的阐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相互弥补，相互完善，哲学思想弥补了文学思想理性的缺陷，文学思想促进了哲学思想向更高的境界发展。苏轼易学对宋易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独辟蹊径“多切人事”的解《易》观点，为他之后的学术界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苏轼的易学思想不同于一般经师，其解《易》多切人事而轻天道的倾向，继承了欧阳修的易学观点，它是在北宋比较自由宽松的学术思潮中产生的一家之学。他独辟小径“多切人事”的解《易》观点，为他之后的学术界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尤其是他对《周易》思想的独特阐释，深入浅出，剔除烦琐的象数推演和玄虚的义理空谈，对学《易》以致用的正确学风，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独到贡献。本文研究苏轼的易学，一是探究其文学与易学的联结；二是从易学来考察其文学的发展，又从其文学成就来反观其易学思想的内涵，来进一步认识苏轼在中国文学史和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分五章，条分缕析地阐释苏轼易学。

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原因和目前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简述北宋的社会背景，主要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介绍北宋文人的生活环境。对当时文人的生活时代进行审视，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苏轼的生活背景进行回顾和反观，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全面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认识。

第三章介绍《东坡易传》的成书过程和缘由。第一节，主要概述了苏轼治易的家学渊源，苏轼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流和学习历程。第二节主要介绍苏轼作《东坡易传》的人生历史背景。第三节苏轼作《东坡易传》的学术历史背景。第四节关于《东坡易传》的作者、系年。苏轼治易除了有深厚的家学传统外，易学上还深受王

弼阐发义理的影响，同时在其《东坡易传》中又含有老庄的思想。苏轼得天独厚的家庭熏染，自身的勤苦学习，饱吸古圣先贤的智慧精华，加上儒释道锻造深邃思想慧根，一生宦海沉浮的雕琢历练，居无定所的恶劣生活环境，磨砺了他的坚韧性格。他一生运用丰富的《易》理来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和苦难，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易》的忧患史，晚年著《易传》，解释《易经》，既是对易学的思考，更多是对自己人生之路的总结。

第四章分析《东坡易传》的易学思想。第一节主要是分析《东坡易传》的哲学思想。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即万物变化皆归于“道” 的宇宙生成论；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自然辩证规律；第二节主要阐述了《东坡易传》的政治军事思想；在政治立场上苏轼从小就有“奋厉当世之志”，虽屡遭陷害，从政报国的志向丝毫也没有动摇，劝告君王体恤人民，爱民，顺民意江山才能长久的道理。军事上强调了富国强兵才能不受外族侵扰，将帅对振兴军威和鼓舞士气的重要性，阐述了“君子”和“小人”对功劳的不同态度。第三节论述了《东坡易传》的社会伦理思想。分别从君王臣子说、君子小人说、婚姻家庭说三个方面阐述了苏轼对《周易》社会伦理思想的独到见解。分析苏轼以传解经，重义理轻象数，“多切人事”的治易方法。从其解《易》中探知苏轼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第四节分析苏轼《东坡易传》的文学思想。 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他高超的文学素养在他解《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注重“文、道”并重，文章当“有补于世”，起到“疗饥”“伐病”的目的。

第五章阐释苏轼易学和文学的关系。共分为三节加以阐述。第一节论述了苏轼的人生忧患促成了苏轼易学和文学人格的形成。苏轼的人生道路坎坎坷坷，颠沛流离， 这些都没有磨灭苏轼的意志，相反玉成了这位天才的作家。他的人生道路恰合了《周易》忧患的主题，他从《周易》中学到的至理使他应对困难游刃有余。第二节苏轼的易学思想促使了苏轼文学思想的“唯变所适”，即“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易学思想中的辩证思想促成了苏轼诗歌充满了理趣；苏轼易学思想中创新变革意识促成了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第三节苏轼文学作品中的用《易》情况。运用易学于政治实践，《易》是他治国安邦、引经据典的蓝本；学易用易于日常生活实践，多见于他的杂记、志林、记游等杂文随笔中，文学中含有易理的华章；学易不是简单的事，需要潜心练习，终身彻悟；著述《易论》道出“尽天下之人情”的至理。

总之通过对苏轼易学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易学不同其它易学家的特别之处，他的易学思想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传世影响。在易学史上，虽没有把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轼的易学单列出来，但苏轼的易学思想在易学哲学史上也自成一家之学说。宋代的易学家“将《周易》的原理高度哲学化。其易学哲学标志着古代易学哲学发展的高峰。”苏轼也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选题原因 1

1.2 文献综述 2

1.3 研究方法 3

第 2 章 历史背景 5

2.1 政治历史背景 5

2.2 经济历史背景 6

2.3 学术文化背景 6

第 3 章 《东坡易传》的成书过程和缘由 11

3.1 苏轼治易的家学渊源 11

3.1.1 苏轼生平及家族 11

3.1.2 苏轼学术渊源 13

3.2 《东坡易传》的作者、系年 14

3.3 《东坡易传》的社会历史背景 16

3.4 《东坡易传》的学术历史背景 17

第 4 章 《东坡易传》的易学思想 19

4.1 《东坡易传》的哲学思想 19

4.1.1 “一”乃“变化之始” 19

4.1.2 “水”乃万物之始 21

4.2 《东坡易传》的政治军事思想 24

4.2.1 政治思想 24

4.2.2 军事思想 30

4.3 《东坡易传》的社会伦理思想 35

4.3.1 君王臣子说 36

4.3.2 君子小人说 39

4.3.3 婚姻家庭说 46

第 5 章 苏轼易学与文学的关系 50

5.1 苏轼的人生忧患促成了苏轼易学和文学人格的形成 50

5.2 苏轼易学思想促进了苏轼文学思想的“唯变所适” 53
5.3 苏轼易学思想启悟了他的文理自然观 55
5.4 苏轼易学思想的辩证思维促成了苏轼诗歌充满了理趣色彩.....57
5.5 苏轼易学思想中的变革创新意识促成了豪放派词风的形成.....59
5.6 苏轼文学作品中的用《易》情况.....60
5.6.1 《易》作为其治国安邦、引经据典的蓝本.....60
5.6.2 《易》理渗透于杂文随笔等日常生活实践中 61
5.6.3 《易》不可速成，需要苦心潜心研习.....69
5.6.4 《易》是“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 70
5.7 《东坡易传》文学思想 70
5.7.1 《东坡易传》文、道并重，劝惩、警世、告诫以 “有补于当世”....70
5.7.2 《东坡易传》四六句式，韵散结合，自然有序，文风行云流水 72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原因

唐宋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散文领域“唐宋八大家”的最杰出代表之一的苏轼（1036-1101年），妇孺皆知是宋诗的奠基者，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他文、赋皆被后世人广泛称颂并争相效仿 ；他的书法被称为宋代三大家之一（苏、米、黄）。然而作为一名经学家，尤其是作为一名易学家却鲜为人知。苏轼继承父亲苏洵“治经传道”之志而认真研究经学是在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云：“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1]次年他又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一》中说：“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2]绍圣四年(1094)苏轼遭到第二次贬谪，在惠州和儋耳的6年间完成了《书传》，并修改了《易传》和《论语说》。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答李端叔书十首之三》云：“某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说》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3]作《东坡易传》是苏轼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和心中理想。苏轼的易学思想涵盖了他毕生的政治、军事、哲学、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 是苏轼丰富和厚重的人生阅历的智能积淀，他的易学思想开启了后人治《易》新的视角和思维力度，说明苏轼不光在中国文学史是耀眼的明珠，同时在思想史和易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易》学发展至宋代，说《易》之书甚多，大致可分为三派：图书之学、专阐儒理、以史证易三个学术流派。专阐儒理的治易家以胡瑗、程颐、朱熹最为著名，代表作品有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胡瑗的《周易口义》。苏轼在当时虽说不上是研究易学的名家，但其《东坡易传》问世在当时学术界也引起了轰动，引起了洛蜀党争。苏轼治《易》也应归入专阐儒理一派，但他多“更切人

[1] 《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696 页
[2] 《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724 页
[3] 《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740 页

事”，研究易学是他对自己人生观和社会观的重新思考和评判，用《易》理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苏轼面对人生之路的坎坷磨难，始终怀着昂扬的斗志，得易于他从小所接受的《易》学思维和《易》理熏陶，“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赋予苏轼面对人生困境，始终不妥协的人格魅力。《东坡易传》是苏轼在哲学领域积极探索的成果，更是他为建构其哲学体系所作努力的结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佛、道三家的智能，《东坡易传》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儒、佛、道三家文化的产物，更是苏轼哲学思想的智能结晶。《东坡易传》完善了苏轼的学说体系，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互相弥补，相互完善，哲学思想弥补了文学思想理性的缺陷，文学思想促进了哲学思想向更高的境界发展。苏学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的。

1.2 文献综述

相对于其它易家而言，目前学术界对苏轼易学思想研究的还不是很多，所谓的蜀学着重研究的重点则是苏轼的诗、文、词、赋成就，且成果丰硕；而其心性义理之学却问津者寥寥，尤其是他的《易》学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目前苏轼的易学研究成果主要有：研究《东坡易传》思想方面的有：如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兼与朱熹的文艺思想比较（冷成金:《文学评论》2002 年第 2 期)；《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冷成金 ：学苑出版社，2003 年 5 月)；蜀学及《东坡易传》研究（张兆勇：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3 月)；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杨庆波、李秀原:《黑龙江教育学院报》2005 年第五期)；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版；山东大学刘兴明的硕士论文:《东坡易传》易学思想研究，2005 年 4 月；着重考据方面的有:《东坡易传》考论（谢建忠:《文学遗产 2000 年第六期》)；也论《东坡易传》作者和系年（金生杨:《文学遗产》2003 年第一期)；着重研究《东坡易传》卦爻辞关系说的有：如《论苏氏易传卦和爻别说》(陈仁仁:《周易研究》2004 年第 5 期)。

上述诸研究多考究《东坡易传》的易学内涵，囿于苏轼解释《周易》的经传中不能自拔，考证苏轼的易学思想不能单从他的《东坡易传》中去探究其思想根源，而应结合他的整个人生经历来验证。本文结合苏轼的人生阅历探索他的治《易》思维根源，易学思想中的义理内涵，易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相互关系，一是探究其文

学与易学的联结；二是从易学来考察其文学的发展，又从其文学成就来反观其易学思想的内涵，来进一步认识苏轼在中国文学史和易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1.3 研究方法

首先，以唯物辩证法作宏观指导，采用传统的考证和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梳理，精选有价值的资料进行精细研究。查阅文献资料并参考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目前研究动态。

其次，选题，论证，论文框架的确立，确立中心论点，明确逻辑层次。

再之，采取文献资料分析法，在吸取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新思想、新的观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2章 历史背景

2.1 政治历史背景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五代十国征战不断，各地农民起义频繁，唐政权摇摇欲坠。公元 960 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公元 961 年，宋太祖为了防止掌握兵权的大将像自己一样兵变，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在 969 年，又召集藩镇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将这些将军转化为广占良田美宅的地主，避免了一场争夺政权的流血斗争，进一步稳固了北宋赵宋王朝的统治。但是北宋中央集权建立之后，赵匡胤没有统一全部中国的念头，北宋的版图没有恢复汉、唐时期完整统一的雄风，北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东北又兴起了金政权。北宋和北方少数民族同分天下，纷争不断。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原地区暂时停息了战火纷扰的局面。北宋统治者能从五代十国灭亡的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武能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为了避免出现战乱的局面，北宋自太祖、太宗时就制定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抑制武将，重用文臣。其办法: 一是重用文人，派遣大量的文官到各地做地方官，直接管理地方的财政，使地方节度使成为毫无实权的虚衔。二是实行更戍法，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让禁军分别驻扎京师和外部郡县，兵将内外定期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朝廷临时任命将官统兵，将和兵没有长期的合作共事关系，这样兵不知将，将不识兵，防止将领专权作乱，有利于皇帝对军权的控制。但是这样却造成了将领和兵士之间缺少感情的磨合，军队凝聚力差，从而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宋仁宗时期，辽、西夏时常侵犯北宋北部边境。为了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中央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扩充军队，加强了禁军的实力，又建立了庞大的地方武装——湘军。但是遇到战事，临阵打仗，将帅受到朝廷制约，只能按图作战，不能机动灵活地针对敌情出击，兵将数目虽多，但是缺乏战斗力，遇到战事北宋军队不堪一击。而北方少数民族，骁勇善战，战斗力强。北宋政权每遇到和辽、西夏的战斗，多数以失败告终。失败后，为了获得暂时的稳定和和平，就对辽、西夏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以求苟安。

宋仁宗在位期间，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皇佑元年（1049年）全国军队总数增至140万，达到北宋养兵的高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员数目也超过太祖时约一倍。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几次大举进犯，宋军大败而归，为了苟安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供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对辽也屈辱求和，增纳岁币，这才平息了边境的战争。北宋内部农民起义、兵变事件一年多于一年。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仁宗曾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执政，企图对吏治作一些整顿，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与富弼提出的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施行新政。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族官僚层和贵族官僚的利益，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宋仁宗害怕范仲淹功高震主，再加上吕夷简、欧阳修的朋党之议，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五月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宋辽澶渊之盟后，国内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北宋政权本着“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1]守内虚外政策，镇压农民起义，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

2.2 经济历史背景

在经济上，与隋唐相比，宋代最为显着的变化是门阀士族的衰微，中小地主阶级兴起，佃耕制代替了荫户制，农民获得了更多人身自由，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北宋政权建立后，战争暂时得到了平息，社会生产、经济呈现为一派繁荣的景象。农业生产方面：荒地被大量开垦，新式农具被大量制造并投入使用，农作物得到大量引进并取得了繁荣发展；工商业方面：手工业得到了很大提高，商业发展繁荣昌盛，四川已经出现了贸易交换的纸币——交子；科学技术方面：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的诞生，闻名世界。这些既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表现，同时又更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2.3 学术文化背景

在文化上， 北宋时期州县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士族子弟和庶族子弟都有入学资格，受教育的范围扩大。私学发展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私人讲学的风气十分流行，

[1] （宋）陈焘《叙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讲学的书院各地林立，学术新思想层出不穷，社会思想也开始酝酿新的变化。在学术方面：首先是两汉经学笺注的风气在北宋已不流行，北宋的学者对汉儒专门从事训诂征实名物的注解经书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如欧阳修不墨守陈规，善于质疑古人的着说，着《易童子问》，大胆提出了《十翼》并非孔子所作的观点。汉代经学要求严守“家法”、“师法”，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偏向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古文经学重视考察经书历史，注重训诂。但是到了唐朝，注释经典基本上远离了经书的原意，如刘敞着的《七经小传》，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许多学者对传统的解释经说提出了怀疑，他门不参考注疏，根据原来的经本原典重新依从自己的观点解释经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疑经潮流说：“设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1]从辩证法的角度评价了这股潮流，是比较中肯的。两汉时易学有三大倾向：一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偏重象数；二以费直、高相为代表的古文易学，以传解经；三以刘安、扬雄伟代表的黄老易学，引老解易。汉末农民大起义，严重打击了汉易发展和流行。魏王弼解《易》以扫除象数专阐哲理，以老庄思想解易，开了易学义理派的先河。“宋代学者推广的与‘象数学’相对峙的‘义理学’，事实上从王弼发其端。”[2]从北宋开始，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与“汉易”解易不同的“宋易”。“宋易并不仅限于指北宋，解易的学风一直延续到清初，北宋则是宋易的形成时期。包括南宋、元、明直至清代。”[3]宋易的发展，跟北宋时期的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关系密切。宋太祖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陈桥兵变以武力取得政权，懂得马上可以得到天下，但是要治理天下却不能靠武力。太祖建国之后，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尊儒重文，大力提倡儒学，太祖以后的皇帝都师从太祖的尊师重道之风，优待礼遇儒士。文字记载有宋太祖“性好艺文”[4]，宋太宗执政时规定“进士需通经义，尊周孔之教。”[5]更以“锐意文史”[6]而称史册。宋真宗时期“道遵先志，肇振斯文”[7]的政策，推崇孔子和提倡儒学，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依靠马上的工夫和称霸天下的武力，而主张通过尊师重道，兴起儒

[1] 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150 页
[2] 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150 页
[3] 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中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 页
[4] （宋）吴曾《能该斋曼录》卷 4,《崇政殿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一，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6] 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华书局, 北京, 1960 年版
[7] 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华书局, 北京, 1960 年版

学，把有作为的儒士通过科举方式扩充到国家政权中来，儒学的地位在宋朝被大大提高了。如 996 年，宋太宗命李至等校定《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注疏。直到咸平三年（1000 年），宋真宗又命翰林学士、判国子监总领邢炳总领校定经书，到咸平四年九月，校定完毕，共 165 卷，宋真宗命令模印后在全国颁行。再加上两汉时政府认可的五经，即《诗》、《书》、《易》、《左传》、《孟子》，到宋时，十二经的注疏都获得了政府法定认可，成为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988 年，宋太宗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当时博士李觉正在给学生讲学，宋太宗就让李觉讲《易》里的《泰》卦，随从的大臣都陪同共同听讲。李觉讲解到《泰》卦的意思就是天地感通，上下交通，事物就能通泰，好比君臣相合，国家必能昌盛的道理一样。太宗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赏赐李觉帛百匹。第二天，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于卿等共遵守之”。[1] 同年，太宗命孔维等人分校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宋真宗赐孔庙诏立学舍，选儒生讲学，重新振兴孔子家乡的学风。同年，宋真宗又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他亲自撰写文章《文宣王赞》，称赞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

宋初的皇帝不仅喜欢读书的儒士，皇帝更是勤苦好学，刻苦读书的榜样。宋太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曾劝告武臣也读书，让操刀的武将了解“为治之道”。[2] 太宗多次对臣下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3]每天都安排有固定的读书时间，读书至深夜才休息，就史书记载“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4]每天读《太平御览》三卷。他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1]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5]宋真宗也很爱书，他说：“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 “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讲论经义，以日系时，宁有倦耶？”[6] 宋初的皇帝，爱书之外，还十分珍惜人才，认识到人才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宋太宗曾说：“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

[1] （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中华书局，1979 年 8 月版
[2] （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建隆三年二月壬寅，中华书局，1979 年 8 月版
[3] （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2，淳化二年闰二月戊寅，中华书局，1979 年 8 月版
[4] （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雍熙元年十月，中华书局，1979 年 8 月版
[5] 李攸:《宋朝事实》卷 3 ，《圣学》，文海出版社，民国 1956 年版
[6]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 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君身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1]为了选拔人才，北宋政权继续采用唐的科举制，通过科举制选拔了大量的士人出仕，取士不问家世门第，凭借才学获得平等录用。为了严防考官营私，考生作弊，全凭经义、诗赋、策论取士，通过科举制，将大量的庶族地主扩充到统治阶级的阵营中，也产生了象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这样的大家。朝廷重文抑武，文化高度繁荣昌盛，哲学、文学蓬勃发展，“士”独立精神的崛起，宋代的文化本质力量“理性精神”得以崛起。“以通经学古为高”，中唐儒学复古运动在北宋呈现百家争鸣局面。

斯大林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若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他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2]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从前代灭亡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佛教不但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统治政权，而且能笼络民心。宋太祖建国之初，就对佛教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后世的几代皇帝都继承了这种政策。除尊重佛教之外，也认识到道教对巩固封建统治必不可少，所以在建国之初，就对道教大力提倡。宋太宗多次召见陈抟、丁少微等道士，并赐陈抟号“希夷先生”。赵宋政权在执行“守内政策”的同时，为了安定内部，强调“黄老之道”，[3]大力宣扬儒、佛、道思想，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宋真宗更是对道教十份狂热，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追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并于此年，亲自到亳州，拜谒老子。宋徽宗对道教的痴迷，更胜过宋真宗，有“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在这种国风的制约下，宋代重要思想家，或多或少几乎都有佛老思想,对佛教经典也都通晓，而且都吸收佛教的哲理、命题、概念等塑造自己的理论体系。 据《宋史•艺文志》:北宋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哲学家有李覯、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颐和程颢等；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他们都精通易学，在学术界掀起了《周易》研究的热潮，着书立说，把儒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也包括苏轼在内，苏轼的思想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中的入世精神使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道家的思想又使他面对各种困境之时，能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
[2] 《斯大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503 页
[3] 《宋朝事实》卷 16，《兵刑》，文海出版社，民国 1956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